社会正义何以可能

——波普尔社会正义观述评

周礼文^{1,2}, 阳建国²

- (1. 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检察院, 湖南 长沙 410013;
2. 中南大学 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3)

摘要: 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依据批判理性主义哲学, 逻辑地演绎出人文主义正义论的价值观和社会正义论原则, 捍卫并超越了自由主义的在体性基础。然而, 其哲学认识论本质上决定了其社会正义观不是一种终极性真理, 而只是一种假设。波普尔留给人们更多的是一种批判精神, 他为那些寻求正义的人们提供了一种建设性的方法和思路。

关键词: 波普尔; 批判理性主义; 人文主义正义论; 建设性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 B82-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313(2005)04-0033-04

作者简介: 周礼文 (1968—), 男, 湖南长沙人, 博士生, 从事科学哲学研究。

正义 (justice), 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命题。在人类的思想认识史上, 有关正义的理论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古希腊先哲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把正义视为国家的一种职能。“正义能给予那些属于国家法制的其他美德——节制、勇敢、智慧——以及那些被统摄在这一普遍的观点之下的德性以存在和继续存在的力量”^[1]。德国体系哲学大师黑格尔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 明确指出国家的非道德性; 但是, 其所指的国家是现存的国家, 而不是“理想国”。西方主流学术思想与此一脉相承。真正有所突破的是马克思, 他认为正义意味着人类的解放、人性的全面发展和自由平等的充分实现; 然而, 在阶级社会里, 道德沦丧为阶级压迫进行伪善辩护的工具, 根本不存在真正的正义。马克思主义思想具有与时俱进的品质, 需要吸取一切人类文化优秀成果、浓缩时代精神, 来不断发展自身。为了解决社会正义实现的问题, 一些思想家提出了思路和解决的办法。西方现代科学哲学家、思想家波普尔在被称赞为当代最伟大的政治思想经典著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 通过对社会重建原则的审查, 提出了社会正义论的原则, 回

答了实现社会正义是如何可能的问题。

波普尔的社会正义论认为: 正义是一个与“剥削”、“奴役”、“压迫”完全相对的概念, 公平是社会正义的基石, 正义意味着人类个体自由平等的真正实现。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 提出了社会正义论的三项原则: “(a) 彻底的均等原则, 也即, 建议根除‘自然的’(天生的)特权, (b) 普遍的个人主义原则, 以及 (c) 这一原则认为, 保护它的公民的自由应当是国家的任务和目的”^{[2] (P189)}。均等原则即平等主义原则, 是有关公民的政治权利问题, 也是波普尔正义观的核心, 它反对任何的“自然特权”, 主张每个公民都具有平等自由的权利。个人主义原则强调正义是一种对待个体的方式, 它不允许以集体利益或最大多数人的利益 (如氏族、部落、民族或国家利益) 为借口否定公民个人的这一基本权利。保护主义原则是公民自由平等权利得以实现的制度保障。如果自由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而不受任何限制, 那么物质上的或经济上的强者

收稿日期: 2005-06-20

就会“自由地”支配、甚至奴役他人，“自由”反而成了“不自由”的根源。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寻求政治上的补救，依据平等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原则建立由自由公民控制的国家来保护公民的自由权利免受他人的侵犯^{[2](P232-233)}。在波普尔看来，国家的理性建构必须从这一基本的政治需要出发——国家应当保护弱者免受强者的欺凌，维护它的公民自由的基本权利。

显然，波普尔的社会正义论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的，他坚持了康德的先验理性主体论。这时，他必须回答两个问题：(1)为什么选择理性主义的态度（人为或先验地设定理性主体）？(2)在坚持理性主义的前提下，社会正义是如何可能的？

二

关于第一个问题，波普尔提出了如下论证：

首先，要澄清“理性”和“理性主义”的概念，主张用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对立置换近代唯理论与经验论的对立。认为人们对理性主义的理解是含糊不清的。从狭隘的意义上看，人们是在唯理论与经验论的意义上使用它，“理性”与“经验”、“观察和实验”相对，“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相对；而在现代的意义上看，“理性主义”是与“非理性主义”相对的概念。波普尔主张：为寻求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要诉诸理性，即清晰的思想和经验，用理性的论证而非情感或激情。相反，非理性主义者则认为：“人的本性”主要不是理性的，应完全由人们的情感或理性直觉来解决问题；在道德领域，主张用抽象的爱作为伦理学的统一基础。对比这两种态度，似乎可以发现：非理性主义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而理性主义态度有一种逻辑上的悖论——理性主义者未经任何推理就接受了这一理性论证的方法，即这一主张本身是一个非理性的决定，它建立在对理性的非理性信仰的基础之上。为避免这一悖论，波普尔区分了两种理性主义的立场。一种是未加批判的或全面的理性主义，它主张所有的假设都应该建立在论证的基础之上，任何不能为论证和经验支持的假设都应该被抛弃；因为这一假设本身不能为论证和经验所支持，所以在逻辑上未加批判的理性主义是站不住脚的，是不攻自破的。另一种是批判的理性主义，承认基本的理性主义态度是建立在非理性的信仰之上——选择理性论证这一问题本身不是建立在理性论证的基础之上的，而是基于对理性的信仰。由于未加批判的理性主义在逻辑上是矛盾的，所以问题不再是知识与信仰的选择，而是两种信仰的选择。

然后，主张用实用主义的标准进行选择。波普尔批判了非理性主义作为正义论基础的合法性，认为非理性主义主张以情感和爱来统一伦理学这一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这是因为：

第一，非理性主义必然导致人与人的不平等性。社会正义的核心是公正、平等。虽然，人生而并不一定平等，但是这不影响是否应该决定在政治上尽量平等待人。“‘法

律面前人人平等’不是一个现实，而是一种建立在道德决定基础之上的政治要求”^{[3](P358)}。诚然，非理性主义者也有可能采取平等的或者公平的态度。但是，由于强调情感或激情，最终不可避免会导致反平等主义的态度。因为，人们不可能抽象地去爱，不可能对每个人都抱同样的态度，感情有亲疏远近之分甚至有敌友之分，人们常常依据情感“把人类分成敌人与朋友，分成属于我们部落的，属于和我们一致的及和我们格格不入的，分成信仰者和不信者，分成同者与外国人，分成阶级同志与阶级敌人，分成领导者和被领导者”^{[3](P359)}。一旦做了这样的区分，政治上的平等主义实际上就不可能了。

第二，非理性主义必然导致社会争端。一方面，非理性主义把人分化为不同阶级、民族、国家，把人与集体联系在一起，以现代社会分化的“我们”来撕裂普遍的道德基础，人们就否认了人类的统一性，这必然会导致政治文化的宗教化冲突；另一方面，爱一个人意味着使这个人快乐、幸福，为了使这个人了解人们对其幸福极为重要，这必然会导致人们把自己的较为重要的价值尺度强加于人，这将导致不宽容，成为社会冲突的根源；同时，由于非理性主义者主张诉诸情感而否认调动理性进行公正与合理的妥协，从而使得和平解决的方式成为不可能，其结果是把暴力和武力作为解决任何社会冲突的最后裁判。

道德的责任是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显然，非理性主义误解了这种道德责任，它试图用爱缔造一个人间天堂；但是，其结果只能是人间地狱。这样，在波普尔看来，理性主义的态度就成了唯一的选择。

三

由上可知，选择理性主义的态度是一种信仰，因此必须对理性能力进行审视和反思。真正的理性主义是一种批判理性主义。波普尔认为，理性不能达到真理，不产生确定性，只产生猜测。在其科学哲学代表作《科学发现的逻辑》中，否决了理性通过归纳法从经验事实获得真理的可能性，并提出这样三个理由：(1)不能证明从单称陈述中推理出来的全称陈述是正确的；因为(2)这种全称陈述总有可能是错的；(3)作为归纳推理基础的归纳原理无法得到证明，任何试图证明的结果不是导致无穷后退就是导致先验论的学说（康德试图解决归纳原理的论证问题，把归纳原理看成是先验正确的）^[4]。因此，试图把任何论证都建立在经验论证的基础之上是不可能的，一切必须从假设或猜测开始。波普尔反对证实论，认为人们同样不能合乎理性地完全证明这些假设。因为，一方面，经验事实总是有限的特殊判断，不能证明普遍性的判断完全为真；另一方面，事实是在理论或假设的指导下进行的，人们通常只选择那些已经与某些先行理论有关的事实。不过，波普尔也反对那种科学循环论，虽然事实打上了先行理论的烙印，但是这并不是它的空洞反复，因为要更加关注那些可以反驳理论的事实。依据波普尔提出的检验演绎法理论（否证

论), 可证伪性是一种理论的科学标准, 一切理论的检验都是企图否定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得出的预言。理性不断提出假设, 并用否定方法比较竞争理论的逼真度优先选择某一理论, 从而使得理论的普遍性水平逐渐提高。“象科学那样, 理性以相互批评的方式增长; ‘设计’ 其增长的惟一可能的方式是发展维护那些批评自由的制度, 也就是说思想自由。”^{[3](P344-345)}

通过对理性的批判, 波普尔发现理性主义的态度即承认自己无知, 是一种愿意听取批判性论证和在经验中学习的态度。“它基本上是这样一种态度。即承认‘我可能错, 你可能对, 通过努力, 我们可以更接近真理’。这是一种不轻易放弃希望的态度”^{[3](P342)}。一方面, 这种态度明白一个人的局限性, 知道自己常犯错误, 甚至要依赖他人才能获得知识, 因此表现出一种理智的谦虚, 反对理性权威主义; 另一方面, “它还是这样一种认识: 我们不必对理性期望过高。虽然争论是学习的惟一方式, 但它几乎不能解决问题——不是看得一清二楚, 而是比以前看得更加清楚”^{[3](P345)}。虽然, 理性进化的方向是从普遍性水平较低的理论到普遍性水平较高的理论, 但是理性不可能直接发明普遍性水平最高的理论, 更不能达到真理。

波普尔认为, 正是这种理性主义的态度使得个人主义和平等主义的社会正义成为可能。

首先, 这种态度表明, 理性得自具体的个人, 来自人们之间的理智交流。因此理论是个人的理论, 而不是集体主义的理论。相应地在道德领域, 肯定个人是价值的承担者, 强调正义是一种对待个体的方式。从这个意义说, 批判理性主义者是天生的个人主义者, 坚持了个人价值的优先性, 从而捍卫了康德的先验主体个人观。

第二, 科学是一种无止境的探索, 理性不能达到真理, 不产生确定性, 只产生猜测。既然我们只能提出猜测, 每个人都有可能出错, 所以必须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 认真对待他人及其论证, 谁都不应该成为自己的裁判, 从而提出了公平、公正、宽容的思想。对理性的信仰不仅是对自身理性的信仰, 更重要的是对他人理性的信仰, 认真对待他人及其论证是获得知识的重要源泉, 他人也有权利为自己的论点辩护。这意味着认可人们对容忍的要求, 或者至少是认可那些本身是容忍的人要求容忍的权利。理性主义的这些公平、容忍的思想与非理性主义是不相容的。非理性主义把理性看作是一种能力, 由于人的天赋条件不同, 必然会导致能力的差异, 从而产生一种理性权威, 出现不平等、不相容的思想。

第三, 理性增长的机制是“试错法”, 而这必然要求思想自由。波普尔设想的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 开放社会的首要价值是自由(虽然平等主义是波普尔社会正义思想的核心, 但自由是一种更重要的价值)。由于对自由的破坏往往来自现实中的强者, 维护自由主要是对弱者自由的保护, 所以政治制度(国家)的建构产生于一种道德义务或责任: 保护弱者免受强者的欺凌。但这种政治权力(国家)

也可能成为破坏自由的源泉, 因而必须是一种民主的、开放的政治, 它应受到自由公民的控制, 公民有权通过和平方式解散它。

第四, 由于理性的局限性, 它不能达到真理, 也不可能直接提出普遍性较高的理论。所以不能奢望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 不可能采用全面的社会革命的方式去实现一种普遍的善, 而只能是在反对具体的恶的斗争中, 采用“零星工程学”、试错法, 以改良的方式去解决社会问题。

最后, 批判理性主义强调语言是理性交流的方式, 而不是自我表达的工具, 这意味着人类有一种共同的交流媒介, 一种共同的理性话语。就人类理性而言, 是统一的, 可以互译的, 预示着存在普遍的(公共的)形式理性和形式正义。因而, 不同阶级、不同国家的人都有道德交流的共同基础, 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一种可能。

这样, 波普尔从批判理性主义的观点出发, 对其社会正义理论进行哲学的反思, 论证了人文主义正义论的个人主义和平等主义的价值观以及保护主义和“零星工程学”的社会论, 以解决“社会正义如何可能”的问题。

四

由是观之, 波普尔的社会正义论即政治哲学是与其科学哲学紧密相连的。可以这样认为: 其科学哲学是其社会正义论的认识论前提, 而其政治哲学观是其科学哲学观的应有之义或逻辑发展。波普尔是依据批判理性主义哲学进行论证的: 首先在哲学认识论上用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对立替代近代唯理论和经验论的对立; 继而依据实用主义原则排除了非理性主义以爱作为伦理学的可能性, 理性主义从而成为唯一可能的选择; 然后通过反思理性能力论证社会正义如何可能的问题。

在价值论和社会论上, 波普尔克服了理性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对立, 认为真正的理性主义只能是个人主义, 与任何的集体主义无关, 从而确定了个人主义原则; 论证了形式正义的统一性和普遍性, 阐明了先验理性主体论对个体及其社会权利和义务的规定, 为自由主义奠定了在体性基础, 即认为先验的理想主体对个体及其社会权利和义务的规定乃是自由主义思想的在体性基础^[5]。在论证自由主义在体性难题(先验或人为设定理性主体问题)时, 波普尔作出了有益的尝试——论证了选择理性主义态度不是形而上学的假定而是必然的选择。如果联系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 那么, 作为“世界3”对象的形式正义是实在的, 在被发现之前, 已自主地存在, 并自主地增长, 理性的作用在于理解这些客体, 参与这些客体之中, 赋予它们以“世界1”的经验内容。个体及其社会权利和义务并不是先验理性主体论规定的, 而是实在的纯粹的形式正义论在“世界1”开花结果的产物。

由是观之, 波普尔在进行以上论证时已经蕴涵了“实在的纯粹的形式正义”的思想, 并以此置换自由主义的在体基础——“先验理性主体论对个体及其社会权利和义务

的规定”。当然，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所阐明的社会正义论不是一种终极性真理。这是因为：（1）虽然波普尔对社会正义的根本问题进行了合理的论证，但是其思想和方法本质上不可能为实现社会正义的技术性难题提供明晰的尺度。（2）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哲学认为，理论的结局就是被证伪，推翻理论是科学进步之轮；所以，其社会正义论也只能是一种假设，而非一种完备的真理。（3）如前所述，批判理性主义的哲学是波普尔的社会正义论的认识论基础，但是，其科学哲学本身还存在一些错误和片面性的问题——从历史主义学派和科学实在论对其科学哲学的批判中即可了解。

需要指出的是，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对柏拉图、黑格尔特别是马克思进行了一系列的攻击，当然其中有许多是出于误解与偏见；这是由于其不懂辩证法的缘故，这恰恰暴露出批判理性主义在面对社会历史问题时的无能为力和自相矛盾性——在此不再阐述。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留给人们的最宝贵的财富并不

是某些具体的观点和结论，而是一种批判精神，一种对更好的解决办法的孜孜不倦的寻求，给那些希望反对暴行、要求正义的人们提供了一种建设性的方法和思路。在当前，对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社会正义、推行渐进式政治民主改革尤其具有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 [1] 黑格尔. 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 255.
- [2] 波普尔.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1卷）[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 [3] 波普尔.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2卷）[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 [4] 波普尔. 科学发现的逻辑[M]. 沈阳：沈阳出版社，1999. 47.
- [5] 韩水法. 社会正义是如何可能的——政治哲学在中国[C]. 广州：广州出版社，2000. 140.

How is Social Justice Possible? — Review on Popper's Theory of Social Justice

ZHOU Li-wen , YANG Jian-guo

(The Peoples Procuratorate, Yuelu Region, Changsha City , 410006;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Executive Administration,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3, China)

Abstract: In the “*The Open Social and Its Enemies*”, according to philosophy of critical rational, Popper logically deduced the values and sociological principle of the theory of humanism justice, which vindicated and surpassed liberal ontisch foundation. In nature, Popper's epistemology, however, showed that his theory of social justice cannot be a terminal truth, but a hypothesis. What Popper gave us mainly is a kind of critical spirit, and he designed a constructive methodology and thought for those people who pursue justice.

Key words: popper; critical rational; the theory of humanism justice; constructive methodology